

河北党史资料

12

革命回忆录专辑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河北党史资料

第 12 辑

(革命回忆录专辑)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一九九二年四月

编审：王桂兰

编辑：费妙兴 余炳荣

内部发行

冀出内刊第 1085 号

河北证照厂印制

32 开本 印张 8 字数 184 千

编辑说明

河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创建的北方党组织的活动基地。其共产党的组织在中共党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七十年来，在河北大地上发生过许多闻名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中夏、蔡和森、何孟雄、王荷波、陈潭秋、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彭真以及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等都曾在河北战斗、生活过。河北党组织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与建设经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因此，把河北党组织七十年的历史资料汇集起来，修史立传，资政育人，无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在1959年至1961年间，我省党史编辑委员会曾组织采访了许多老同志，并帮助他们写下了部分革命回忆录。本辑党史资料收集了其中的34篇访问记，内容绝大部分是回忆建党初期和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些老同志对所见所闻的追忆，从不同侧面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战斗历程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勇于拼搏、前赴后继的民族自强精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证词。

由于老同志所追忆的历史相去久远，再则当时的历史条件也

不允许党员知道更多的事情，因此这些回忆难免会有一些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之处。但尽管如此，作为历史见证人和知情者的追忆，记述了许多文献资料所没有的内容，便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次的编辑过程中，为了尽可能保持这些采访录的原文全貌，我们只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故文句或有不甚流畅、通顺之处，还请读者谅解。

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室



目 录

北方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	刘清扬 (1)
回忆党的早期活动	刘仁静 (29)
党的“一大”后我的一段经历	包惠僧 (32)
北方党的早期活动	朱务善 (39)
回忆北方区委的成立	肖 三 (45)
20年代初我的革命经历	臧恺之 (49)
1928年以前的一些回忆	王重民 (53)
北京市委与“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斗争	刘锡五 (57)
回忆我在北方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	王冶秋 (59)
我在河北工作的两年	朱理治 (62)
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河北	黎 玉 (66)
1930年夏天后我的一段经历	平杰三 (68)
30年代我在北京、平山的经历	栗再温 (73)
难忘的记忆	张秀岩 (78)
1928年至1930年间的河北党	徐彬如 (92)
30年代初省委在天津的活动情况	安子文 (98)
30年代我在河北的革命经历	陈少敏 (102)
河北省委反“铁夫路线”的经过	孟用潜 (108)
1937年以前河北党的斗争	李一夫 (111)
抗战开始前后河北党在天津的活动	姚依林 (122)

30年代我在河北的革命斗争	李菁玉 (128)
大革命时期玉田县党组织的建立与斗争情况	张明远 (146)
1924年至1938年乐亭党的活动情况	荣 光 (154)
二战时期迁安的农民运动	高继先 (159)
忆“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	葛 琛 (162)
抗战以前我在冀中	陆治国 (165)
关于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及其他	李培淮 (173)
30年代我在冀中的革命经历	张 君 (176)
高蠡游击战争	王 之 (181)
回忆在保定天津等地从事地下斗争	侯 薪 (192)
隆尧县党的早期活动	霍子瑞 (201)
30年代直南的革命斗争	王 明 (208)
1935年前后濮阳一带的农民运动	王从吾 (220)
直南农民暴动和抗日斗争的发动	马国瑞 (228)

北方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

刘清扬

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北京、天津的爱国青年认清了奋斗的方向。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特别是对北京、天津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这又决非偶然，在更大程度上则是基于满清的懦弱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人民爱国思想的增长等因素所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的第二十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第十七年时是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中、日甲午战争给予中国人民的刺痛是很深的，使稍有知识、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人都感到了国家民族的危机。在这以前的太平天国革命和白莲教起义，对北方人的影响不是很大，更不理解它的革命意义。但“马关条约”的签订，却异乎寻常地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自尊心。

“马关条约”之后，对北方人第二个重大的刺激就是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因这仅是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六年半之时。当“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除去经济侵略外，最主要的则是文化侵略，通过宗教的传播、麻醉毒化人们的思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到处建立教堂，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实行愚昧政策，人民由于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以及外国侵略而造成了生活极端贫困，迫切要求生活的安定与保障。于是，帝国主义就欺骗说：安定生活是上帝赐予的，只要你们尊从上帝，服从上帝的旨意，上帝就赐福于你们。这样，很多人便抱着幻想信了他们的宗教。而所谓服

从上帝，就是要人们老老实实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要反抗。他们则变本加厉地迫害人民。城市的人民在反动统治者直接压迫下，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能吃亏忍受。但广大劳动农民却不会忍气吞声，不久便群起组织“义和拳”（首先在山东组织起来）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尽管他们没有什么组织计划和政纲，而且开始时又是用迷信的方法鼓动群众的，但却足以显示了人民的斗争自觉性。当时，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农民这种反抗情绪是不了解的，且不以为然。但当“义和拳”逐渐发展，改名为“义和团”，以致真正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时，正遇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满清政府便利用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拉拢义和团与帝国主义作战。当时，正是农历六月暑热的天气，天津老百姓扶老携幼支援前线，源源不绝地给前线送大饼、绿豆汤，广大人民这种爱国的行动，在天津表现得很强烈。然而，清朝军队手持枪炮武器也还抵抗不了八国联军，义和团仅仅用旧式长枪大刀，当然就更抵抗不了敌人的进攻。这样，帝国主义顺着海河步步深入，以后进占了紫竹林，天津就完了。

帝国主义进占天津，首先烧杀抢掠，人民受到残酷的蹂躏，锅店街的大商号被放火焚烧时，老百姓去救火抢救东西，外国兵就在城墙上用枪打这些人。我亲眼看到一个年轻人去救火，没有一小时，就被打死抬回来了，大家围绕着死者，非常痛恨帝国主义。抢烧过去以后，外国鬼子们（中国人恨外国人，对外国人称“鬼子”或“毛子”）挨家要鸡要鸭，翻箱倒柜抢东西。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先进天津，他们谎称：“只要挂上太阳旗，就可免遭杀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天津西北城角一家姓曹的，全家人都被鬼子在城墙上打靶似的对准打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天津人民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这些民族的仇恨，是永难遗忘的。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又进占了北京，北京人民同样遭到了涂炭和蹂躏。1901年清朝与入侵的帝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自此以

后，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侵略更加深入，并根据“辛丑条约”在天津设立了英、法、日、意、俄等国租界。美国虽无租界，但设了兵营，美国兵可以随意屠杀在兵营附近行走的中国人。他们还拆掉了天津城墙，开辟了环城马路。瑞士和比利时还在天津投资兴修电车路，这是吸取中国人血汗的经济侵略。在行车时则更是毫不顾及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有一次，在西马路压死了一个回民的小孩，那回民就在电车道上愤怒反抗叫骂终日，不让电车通行。这实际上反映出了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英国在天津西北城角建自来水塔，由一个中国工程师设计和估价，并订立了建筑水塔的合同，但由于中国工程师缺乏经验，估价估得低了，建到大半便因钱不够工程不能进行，但英帝国主义却以合同要挟，一定要工程师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结果，中国工程师被逼得在水塔上吊死了。在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的危急存亡之际，最敏感的首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清朝末年，一部分改良主义的官僚，企图缓和人民反满的情绪，因而醉心于学欧美，主张建立学堂。我12岁时，天津开始有了学校，我有了读书的机会。当时，教员一上课就讲中国有被外国瓜分的危险，并以朝鲜亡国的惨痛教训为例，讲述亡国奴的生活是：居家生活，家里不许有刀，而在公共场所用铁链子拴一把菜刀供大家使用；人与人之间没有说话的自由，如有三人在一起说话，就会被捕。因此，虽是幼小的学生，听了也都感到惶恐。老师给学生灌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鼓励学生要奋起救国，这对我们年幼小孩子的教育，是很深刻的。所以，我从13岁时，就有了“国亡无日”的忧虑，因而，立志抱定救国的决心。在有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况下，人人想要救亡图存。特别在天津，由于八国联军的长驱直入，使大家认识到没有国防的可畏。由于清朝西太后把建设海军的经费修了颐和园，所以，人民对满清非常愤恨。当时，没有海军就等于没有国防，就不能保卫祖国，于是，人民群众便想挺身而出，保卫祖国。在我13岁那年

年，就有人发起了各界人士的“救国储金”运动，想用人民捐款建设海军。第一次在广东会馆召开大会，宣传“救国储金”，当场捐钱的人很多。我捐了一个价值13元现洋的金戒指。第二次在河北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群情激愤，有一个学生断指血书“国亡无日”四个字，群众又捐了许多钱。后来，把这些钱存入了银行。在我家，有半年不吃早饭，把早饭钱都捐了出来。直到我17岁时，国民捐救国储金，共办过三次，但捐款仍不够买一条军舰。后来，捐款的发起人，不得已主张把钱还给热心救国的人民，可是，有许多人没留下收条，结果使银行的资产阶级发了财，当时这种办法虽是很愚蠢的，但却表明这是人民群众在迫切地寻找救国的出路。在这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反对满清的辛亥革命，所以，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号召下，参加了这场革命。那时，我们并不懂得那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只是想保卫国家，建立民国，要求民主，不要专制皇帝，于是，就不顾一切地拼命，虽杀头流血，也在所不辞。但辛亥革命的结果，教育了大家，知道还是换汤不换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皇帝，但又造成了封建军阀的割据。封建军阀为了巩固其统治权，纷纷投靠帝国主义寻找保护伞，军阀从四面八方引狼入室，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这就不能不使人民失望而愤恨，所以，在民国初年，有志之士即认识到辛亥革命不能满足人民的救国愿望，便转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当时，我曾积极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我母亲问我，“你们的革命成功了，不过是坐轿子的换了坐马车的，这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好处？”问得我张口结舌，这句话道出了人民对辛亥革命的不满和失望。

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失望，对军阀割据愤恨。他们有个理想，就是必须改变国家现状，而找出真正的救国道路。就在这时，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了，使苦闷的人们为之振奋。当时报纸上也有些消息透露出来。虽然还不能完全真实地报道革命

的情况，一般人对苏联的革命精神也还不完全懂得，但人们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知道了列宁这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深深地受到鼓舞。在此前后，也有些人介绍过社会主义，尽管这些粗浅的介绍，与马列主义的真理，还相差很远。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代表无政府主义的，南边有吴稚晖和广东人刘师复，北边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黄凌霜和谭平山，其中以刘师复作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比较普遍广泛，使许多青年受了影响。主张社会主义的有北京竞业中学校长陈翼龙，他的思想是很进步的，是个苦干的人，他以竞业中学为革命活动的基础。当时邓颖超的母亲就住在竞业中学，思想也很进步。另外，还有江抗虎和姜航若等也宣传过乌托帮社会主义，在那时也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二人后来都成了汉奸）。在“五四”以前，中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思想是很复杂的，他们由于十分不满现状而寻求理想的出路，他们中间有的追求社会主义，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那时，我们正在受启蒙教育的初期，已开始知道祖国前途的黯然可畏，因而有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回忆起我六七岁时，所受到八国联军侵略的刺激，所以就立下了救国的大志。但在救国储金运动三次失败以后，自己就不能不寻求革命救国的出路，因而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失败后，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就给激进爱国的青年们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熊成基是安徽部队中一个队官，因反对满清政府的统治，起义未成，而被杀了头，吴樾用炸弹行刺出使日本寻找君主立宪方法的端方，结果自己被炸死了，以后秋瑾也因在浙江参加革命而被杀。满清给被杀的人照成一尺二寸的大像片，叫人们看，借以吓唬人民，其结果是适得其反而更激起了人们对革命志士的同情，对满清政府的痛恨。所以，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还给中国青年指示了出路。但这时如无人去指引也不行，那时正是北京文化革新的时候，李大钊是文化革新的领袖之一，他最早接受了苏联的革命思想，并把它灌输到青年中去。当时最准确地掌握苏联革命的真理，最坚

定地引导走向苏联革命道路的，在北方首先就是李大钊。由于李大钊对青年的宣传教育，因而使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了中国以很大的震动和鼓舞，这种震动当然在形式上是看不出的，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搞大示威大游行，由于封建军阀的统治压迫还很厉害，对进步的人们都给加上“过激派”的帽子，所以不能搞大游行，群众的觉悟不够高，也不敢参加。但是，十月革命，使有志爱国救国的人们在心理上增添了很大的力量。接受十月革命影响最早的是北京，接着就是天津。其次昌黎也开化得较早。李大钊是乐亭人，经常到昌黎山去，而且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在昌黎也成立得较早，传播了文化知识，这就为接受新思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昌黎也是河北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在昌黎出了几个革命老人，有：江注源，是老国民党员，因不满国民党，后来就加入了共产党；高继先是老共产党员（在唐山烈士陵园工作）；杨扶青，是个主张实业救国的进步人士，他没有加入共产党，而成了实业救国的资本家，但他常用挣来的钱帮助进步青年。这几位是李大钊的朋友，他们都是生活朴素，品质高尚的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但使有志救国者，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而且使群众也有了向往光明前途的希望。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结下的最大果实，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

二、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天津的传播，各种先进团体的建立。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天津觉悟社新生社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辩证唯物主义在我国还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开始注意十月革命的有李大钊、瞿秋白等。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以及给“新青年”写文章的人，在文化革命上是起了先进作用的，但由于那些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关系，以后就分化了。与李大钊一起向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最早的陈独秀、张申府也在半路上走向了反动道路。“少年中国

学会”、“新青年”、“政治评论”等，对北京天津青年的教育和启发是很大的。但开始还谈不到马克思主义，只是对苏联革命一般的认识，启发了向往的要求。李大钊当时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思想，就开始钻研十月革命这条道路，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知识。在北京与李大钊在一起的有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张申府、高君宇（高尚德）、黄日葵等。瞿秋白是北京俄文专修班的，其他都是北大的同人和学生。与李大钊最接近的还有张国焘、于树德和我。在天津“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就是“觉悟社”的社员们，因而，觉悟社也较早地接受了李大钊的影响。本来天津的文化就比北京落后，帝国主义入侵后，天津成了商埠，是买办资产阶级发财的地方。能够接受先进思想的就是青年学生，是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革命组织的建立是和“五四”运动分不开的。

“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曾集合一些进步教授和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时，核心力量的人数并不多，但群众的力量是从核心的思想影响和号召下鼓动起来的。李大钊认识到国家的力量在青年，所以他的生活和工作离不开青年。他对青年的教育和组织，不是见了面就给你讲一套，而是用他本身的工作态度和他的思想的吻合一致、以温和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关怀青年，给青年指出学习的方向，这是一种不言而教的作风，在青年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同时，李大钊在教授中也有很好的人缘，他具有一种吸引力，能发现人的优点，抑制其缺点，使人愿意听他的指引。他能体会人们要求进步寻找出路的苦闷，而加以引导。所以，许多教授也听他的话。他的小核心加上他的思想与领导作风，在北京大学有很大的影响。他不象陈独秀那样自以为是，也不象张申府那样自命不凡，以哲学家自居。李大钊具备无产阶级的品质，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能发挥出无限的力量。在他周围有

许多人，不是有形的组织关系，而是对他思想的向往。

天津“觉悟社”的组织，是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产物，天津爆发“五四”运动，是由两部分人鼓动起来的，一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学联中都是男学生；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青年。当时在青年妇女中，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存在的，认为爱国运动应该第一是男女并肩作战。“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人是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郭隆真、邓颖超。我是女师的校友，当我去女师母校探听消息时，他们正在组织发起筹备会，因而郭隆真把我拉了进去。郭隆真当时响应“五四”运动，非常热情积极。因我在女师学校读书几年，校友关系很好，而且是个喜欢向顽固校长斗争的学生，郭隆真便提议选我当会长。副会长是李毅韬（后改名李峙山），她也能说能写很能干。“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宣传队长是郭隆真和邓颖超。“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同学们团结的力量很强大很广泛，所以在妇女界里搞得有声有色。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是谌志笃，副会长是马骏。马骏很有讲演的天赋，在群众中的号召鼓动力很大。当时差不多的运动，都是这两种力量走在前面。

周恩来是民国六年在南开毕业的，毕业后到日本留学，“五四”运动初起时还没在天津。天津“五四”斗争起来以后，大家对斗争的要求逐渐提高了，对于专搞抵制日货运动和仍用一般的救国口号，不免觉着贫乏和单调。同时反动统治者一再镇压学生运动，总压不下去，就想在暑假中缓和青年的斗争情绪，叫各校提前放假，叫学生于放假后一律回家，让学生家长管制学生。敌人使用这种阴谋在当时是有一定效果的，使一些青年学生动摇了。他们说：曹汝霖等已经罢免了，在巴黎和会上也拒绝了签字，没有什么可斗争的了。这时马骏等估计对学生斗争不利的形势要来了，应该出一种能鼓动青年学生坚持斗争的刊物。正在这时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住在青年会，马骏等听说周恩来回来了，都

很高兴，就去找他，并说明学联会的情况，需要创办有宣传教育意义的会刊，并请他主编这个刊物。周恩来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在七月二十一日第一期学联的会刊出来了。刊物一出来，就以国家危机的客观形势，深入分析并进行宣传鼓动，指出爱国斗争不是短时期的事，针对群众情绪，提出了救国奋斗的长远大计，指出救国要依靠人民做主力军，以保卫祖国，号召各界爱国人民，坚持长期奋斗下去，并揭穿了反动统治者要求各校提前放假的阴谋，指出学校是学生的大本营，坚决不能离校，这个学联刊物出版后，不但学生们爱看，而且各界群众也争着购买阅读，因此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所以说天津学联会坚持斗争的中心思想和战斗策略，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坚定了爱国救国的意志奋斗到底而取得最后胜利的。我们这些积极的人们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一个战斗策略接着一个战斗策略被提出来。革命斗争要有群众，也要有干部，干部决定一切，干部在群众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北京学生联合会因为都掌握在资产阶级青年手中，他们不能体会李大钊的思想，而天津周恩来的先进思想，能随着苏联革命的发展而追求前进，能体会李大钊的领导思想，所以，往往是天津的斗争策略能带动其他各地，进而带动了全国的爱国运动。

1919年8月23日，我们天津派10个人到北京与北京学联会联合举行第二次请愿（第一次请愿是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第二次请愿是山东派代表来津，要求支援山东爱国斗争，请愿的目的是要求惩办在济南枪杀了爱国群众领袖的山东镇守使马良，我们事先估计这次斗争不容易取得胜利，因为反动统治者是官官相护的，所以只派一批人去请愿，留下马骏等一批人做后继支援。请愿的人到北京后，联合北京学联代表，共25人，在新华门请愿，当天代表们就被逮捕了，并且几乎都被枪杀。代表被捕后，马骏带了一批人前去北京营救，在天安门举

行了大示威，激起了全国的支援。结果于8月30日，被捕的人们终于被释放，斗争取得了胜利。

代表们回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学联的刊物已经不适应，需要创办一个更有革命性的理论刊物，于是在8月底9月初决定出一个叫做《觉悟》的刊物。后来又考虑以什么来领导这个刊物呢？于是在9月16日正式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最初仅20人，完全是由学联和女界同志会的主要骨干组成的。根据男女平等的原则（当时是有点幼稚的平均主义），在20人中，男的10人，女的10人。女的因人不够，又凑了两个。“觉悟社”的思想领导人是周恩来，组织的宗旨是学习革命的理论。大家生活在一起，共同出钱共同生活。有些青年向往这个组织，要求参加，但我们对加入“觉悟社”的要求很严格，必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有坚强的意志，善于领导群众进行坚决斗争的，所以其他要求加入的人都称之为社友，“觉悟社”的组织形式是委员制，用抽签的方法，按抽的号序排列，当时预备了50个号，结果年纪最小的邓颖超抽了第一号，因而她的隐名改为“逸豪”，周恩来是第五号，叫“伍豪”，马骏是八号，我抽了个二十五号，隐名是“念伍”，李毅韬是四十三号，后改名为“峙山”。学联会的会长湛志笃是五十号，隐名叫“伍零”。“觉悟社”的成立是初次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实行男女合组（过去的组织都是男女分开），社会上虽有闲言乱语，可我们不管这些无聊的攻击。但为了表明我们是真正革命的组织，不给人们以口实，社员之间的生活很严肃，不能谈恋爱，决心把“觉悟社”办成走向坚持革命斗争道路的先锋组织。

觉悟社成立后，就报告给李大钊，9月21日李大钊就到天津，来给“觉悟社”讲了话，他赞成我们打破封建的男女合组，赞扬我们的革命意志，给了我们很大鼓励。组织成立后，天津学生运动因有了核心，更快地发展起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决心要镇压学生运动，我们就搞了个“双十”示威，给他个先发制人。这